



中共宁夏党史概述（七）

邢万莹

文化大革命时期

（1966.5—1976.10）

1966年5月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宁夏跟全国一样，各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遭到了严重破坏。

1967年1月27日，自治区党委被群众“造反”组织非法夺权，成立了“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”，行使各种权力。1967年12月，成立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，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。1968年4月，成立了以康健民为主任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，实行党政“一元化”领导，下设政治部、生产指挥部、保卫部、办公室（即三部一室），党的工作由政治部负责。1970年3月，成立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，康健民任组长。1971年8月，恢复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，康健民任第一书记。1973年7月11日，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撤销，自治区党委下设办公室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四个工作机构，直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。

尽管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到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，但我们党终于取得了胜利。党、人民政府、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。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指战员、知识分子、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。从整个国家来说，我国国民

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，但仍然取得了进展。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，工业交通、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，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，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资，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等。宁夏亦同样，广大党员干部、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、宗教界人士等虽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，但绝大多数都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，始终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、拥护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。在经济建设方面，一批新企业建成投产，还迁来一批工厂，特别是煤炭、水利、电力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，全区粮食、油料作物丰收，社会治安明显好转。

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

（1976.10—）

1976年10月，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，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。这个时期，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过程：

1976年10月至1978年底，各方面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为了改变宁夏的社会环境，使之走上有序发展的轨道，1977年1月，中央任命霍士廉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，1978年4月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。一批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冲击、迫害的忠于党的事业的老同志陆续被“解放”，并进入各级领导班子。

宁夏党史大事记（四）

邢万莹

1930年5月 苏雨生部奉冯玉祥令移防甘肃平凉。当部队行至固原时，受到甘肃军阀黄得贵部阻击，损失惨重。苏雨生率部撤回宁夏安堡（今中宁县城）时，又遭到马鸿宾部治成章旅的包围攻击，处境十分困难，该部石于俊、王子元旅脱离苏雨生，投靠甘肃省代主席王桢，后被改编为雷中田部第八师第三旅，驻扎靖远。在苏雨生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及中共党员，亦随军离开宁夏去靖远。

1930年5月 中共北方局派原北平市委领导成员、组织部长杜润滋（杜自生）来宁夏省城开辟工作，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。杜润滋利用与杜立亭同乡、同学关系，在宁夏中学任教，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。

1930年5月 宁夏中学教师黄执中，回陕北米脂县接家眷，宁夏中学校长徐宗孺请其代为学校聘请教师。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这个机会，派中共党员赵子元、马汉文、高锦尚3人來宁夏中学任教，并协助杜润滋开展党的工作。

1930年9月 马仲英从山东泰安马鸿逵部重返宁夏省城，企图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。马鸿宾根据马福祥、马鸿逵电报，委任马仲英为教导大队队长，以资羁縻。同时，任命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学员、中共党员高锦尚为教导大队参谋长兼教官。

1930年10月 8日，河南开封一中教师、中共党员郭逸民、刘梅村，进步青年何高民（何飞生）等人因当地党组织遭破坏，由北平来到宁夏省城。何高民通过其亲戚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的关系，在省财政厅谋得一职，并安排郭逸民在宁夏中学任教，刘梅村在宁夏师范附属小学任教。不久，郭逸民、刘梅村与杜润滋接上组织关系。杜润滋、郭逸民、刘梅村、赵子元、马汉文5名中共党员，以宁夏中学为活动基地，建立了党的组织，杜润滋为负责人。

1930年10月 宁夏中学因发放助学金不公，引起部分学生强烈不满。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，学生杨生连等带头多次质问宁夏县长和校方，被学校挂牌开除。杨生连不服，砸了牌子。进步学生梁大均等人带领学生前去质问校方，同一些落后学生发生争辩，引起殴斗。宁夏当局派军警包围了学校，先后有十几名学生被军警抓走，杜立亭、杜润滋、郭逸民等人挺身而出，反对当局抓人，发动学生张贴标语，散发传单，揭露当局逮捕学生行径，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。当局为了平息学潮，调离校长徐宗孺，任命进步教师杜立亭为校长。

■宁夏革命英烈■

刘伯坚：一个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（上）

邢万莹



刘伯坚（1895—1935年），原名刘永福，又名刘永固，后用刘铸、刘铁侠，在国外曾用名刘大冶、毅伯等。1895年1月9日生，四川省平昌县长岗寺人。

刘伯坚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。祖上在龙岗寺小集镇以开钱房为生。

刘伯坚6岁入学，勤奋好学。曾就读于龙岗寺刘贵义私塾、文昌宫易子仪国民小学、苟俊生书馆、岳家寺金山寨高等小学、巴中县立中学、万县高等师范、成都高等师范学堂。最终完成大学教育。

在求学期间，刘伯坚善写文章，成绩优异。同时，也很注意锻炼身体，关心群众疾

苦，曾白天打着灯笼，讽刺当时社会的黑暗。尽管当时政府准备任命他为苍溪县县长，但他辞而不坐，毅然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。

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成都也掀起波浪，刘伯坚走出学校，奔走于学生士兵之间，演讲、写文章，积极宣传革命的新思想，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，决定到欧洲去寻找革命的真理。

1920年6月，他与朋友们离开家乡，到法国勤工俭学。先后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半工半读，又在比利时的霞洛瓦做工。在这里，他学习了《资本论》《共产党宣言》《法兰西内战》及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，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、坚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，并参加了旅欧留学生和华工的建党工作。

1923年，中共旅欧支部将刘伯坚等同志送到莫斯科的“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”学习。并被推选为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人，连任旅莫支部书记达3年之久。

在东大学习期间，刘伯坚非常努力，生活也很刻苦。他组织同志们与错误的言论及倾向作斗争，还与旅莫支部负责青年团工作的曾涌泉、法文翻译王仁达创办了《前进报》。

1924年10月，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。将其所率部队改称为国民军。后来，冯玉祥因军事失败进一步倾向革命。1925年秋末，冯玉祥委派鹿仲麟等一批国民军高级将领到苏联参加学习。同时还送来了一批失业失学的知识青年，组成“学兵团”，也送到苏联学习。刘伯坚、曾涌泉等组织了东大一大批积极分子

去接待，且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。

1926年春，冯玉祥在国内军事上完全失败，他随即通电下野，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帮助下，携家眷取道外蒙古库伦（今乌兰巴托）赴苏联“考察”，并寻求外援。共产国际决定争取冯玉祥，并派刘伯坚参加这一工作。借此，他与冯玉祥谈了国际国内形势，并对国内政局的发展进行精辟、透彻的分析，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还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，分析如何才能彻底解放劳苦大众，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，阐述必须积极推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。

经过苏联政府领导人、共产国际负责人和在莫斯科的刘伯坚等的谈话和争取，冯玉祥表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，要向苏联共产党学习，军队要改组，要向苏联红军学习；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好，西北军中也要设立政治部。冯玉祥很器重刘伯坚，在他回国时，他向共产国际提出，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。

1926年9月16日，冯玉祥、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一行，从苏联回到绥远省的五原县，举行了“五原誓师”，将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，冯玉祥自任总司令，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。

刘伯坚在政治部内设立组织处、宣传处、总务处三大机构。在联军政治部以下又设立了军、师、旅、团、营各级政治部。这时，一批优秀共产党员都参与了刘伯坚领导的联军政治部工作。

（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，中共党史专家）



从票友到编剧——戏痴肖维章（一）

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



肖维章。（图片由本人提供）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革命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曾火遍祖国大江南北，北京电影制片厂还将中国京剧院演出的《杜鹃山》拍成电影。在那个文艺作品特别稀少的年代，街头很多行人都会哼上几句《杜鹃山》的唱词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革命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最早出自宁夏，最早的剧作者是宁夏京剧团编剧肖维章。

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从南京移民来宁的国家一级编剧——肖维章。

肖维章，男，回族，祖籍江苏高邮市，生于1916年。长期在南京居住，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，青年时期就喜欢上京剧艺术。据宁夏京剧团第一任团长石天撰文记载，肖维章10岁时随家人一起离开合肥，来到南京。当年的南京汇聚着全国文化精英、戏曲种类门派繁多。有一家大型游乐园叫民业公司，有点类似上海的“大世界”，各类门派都在此竞相亮相，这既是南北文化汇集之地，也有各种文化摆场打擂的意思，在集各种娱乐形式之大成的艺术门类中，最吸引肖维章的还是京剧。

1933年肖维章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。尽管学的专业是经济，但他又选修了文学课中的中国戏曲，聆听过章太炎、胡适之等文学大师的讲座，田汉也常常来到学校与学生交流，为他此后步入京剧艺术之门积累了文学和艺术的厚度。当年誉满民国的徐悲鸿先生也在中央大学任教，在这些大师的照耀下，肖维章头脑中潜生的艺术细胞被激活，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年龄的增长渐凝精华。

1937年夏天，肖维章大学毕业，在准备人生选择时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，辗转流亡，绕道安徽、江西、湖

在西大滩落地生根的浙江支宁人（一）

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



林国进。（图片由本人提供）

我是10万浙江支宁人中的一员。

1960年5月，我放弃老家民办教师身份参加到支宁队伍中来。那时候才十六七岁，怀着对大西北的好奇和新生活的憧憬，响应党和政府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，和浙江第二批支宁人员一同来到宁夏，来到西大滩前进农场八队，从此迈开建设农场的第一步。

当时的条件艰苦，南方人对西北的生活很不习惯。我们来到农场之前，队上的老军工都搬到牛圈、马圈或者羊圈里住。而把建场初期一砖到顶的窑洞房腾出来给我们住，并打扫得干干净净、盘好了炕。炕上还铺着新芦席，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。我们队部周围，只有窑洞房前长着几棵沙枣树，据说是老军工换土栽活的。一个窑洞住三四家，通常拉个帘子，这边住一家，那边住一家。

队上有一口水井，也是老军工在建队时人工挖出来的，有3米多深。收工回来，大家端着盆子到井边排队打水洗脸、洗衣服。由于是地表水，井里的水是碱水，衣服洗了晒干后，上面凝着层“白霜”，汗渍留在衣服上，一圈一圈地发硬。冬天水井见底了，只能留给食堂做饭用。到休息时才允许大家洗衣服。由于不服水土，加上干燥，很多人嘴唇裂开了口子，嗓子总是干干的，说话的声音哑哑的，鼻子天天出血。最讨厌的是蚊子，个头比老家的大，一叮一个包，特别的痒，脸上身上都感染了，又痛又痒。搞得人浑身难受，坐立不安，无法入睡。刚来时，我们年轻人光着身子躺在炕上，翻来

南、湖北，最后西上三峡，抵达重庆。直到抗战胜利才又回到南京。这期间，他和好友一起办起了票房，举行义演，传递和平思想。同时在中山陵园管理处兼做植物种子配置工作。这时的他在艺术上更趋成熟，不仅写戏、演戏，还涉足剧评，在南京票友界有了一定影响。

1948年秋，肖维章供职的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处发给他全家去台湾的船票。由于对前途迷茫，肖维章到了上海却没有去吴淞口码头，而是与家人一起，暂住在上海闵行乡下的同事家。直到南京解放后返回。

1958年的夏天，在一次票友聚集中有人告诉他，宁夏回族自治区准备成立，宁夏的领导正在南京招人，肖维章本身是回族，要成立回族自治区吸引了他，于是肖维章结识了在南京招才纳贤的丁毅民。丁毅民当时是宁夏工委筹备组领导，也是资深文化人。开口一聊就品出了肖维章是个有艺术功底的人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当年9月，肖维章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和特有的民族情感，携全家三代八口人西迁，从扬子江畔移民宁夏，来到塞上古城银川，并将宁夏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，从此扎根在这里。被分配到宁夏京剧团编导室，置身喜爱的京剧工作，艺术才华得已显露。

刚到银川不久，肖维章因剧本创作原因去吴忠采风，被天高云淡下的雄浑黄河、纵横稻田、古朴民风激发灵感，写下了一首小诗：

我自江南来塞上，方知塞上亦江南。
绿树含烟江南柳，不让江南水如蓝。

从来宁夏的1958年到1963年间，肖维章先后独立完成创作、改编、整理、移植了60多个剧本，其中的《红旗谱》《六盘山》《金积堡》《劈山救母》《陆文龙》等戏还是根据演员阵容并综合剧团物质条件专门写成，在宁夏京剧艺术领域开创了因人设戏、应条件编剧的先河。演出效果也特别好。不仅观众满意，演员也容易入戏，可谓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演起来也得心应手。观众满意、剧团满意、领导满意是大家对这段时间京剧剧本创作的评价。

这期间肖维章还在团长石天、副团长孙秋田的支持下，与股元、蔡宝华等人合作，创作出了几部京剧现代戏，比较成功的有《红旗谱》《六盘山》《杜鹃山》等，尤以现代革命京剧《杜鹃山》为最佳。（马君武 王旭阳 商银生）

覆去无法入睡，思念家乡和亲人，一人忍不住一哭，全屋的人都哭开了。

全队有一个大食堂，炊事员就有20来人，分8个窗口打饭。那时职工打上饭，就地一蹲，三下五除二地吃完，再用水冲一下，把吃剩下的饭渣连水一骨碌倒进了肚子里。刚来农场时，我们职工每月的口粮定量40斤，食油半斤，按正常的饭量是吃不完的。可是一日三餐，就是馒头、稀饭或米和面，副食没有，蔬菜很少，肉就更少了。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炖白菜、炖土豆，改善一下生活就不错了。

为了准备冬菜，7月底在当年收割完麦子的地里，抢茬种了100多亩白菜，60多亩黄萝卜。那年秋天雨多，出苗齐，经过精心管理，喜获丰收。临冬职工把这些菜拉回，整整齐齐的垛在菜窑里。下班后，大家都提着铁锹在收完白菜的地里挖白菜根，在黄萝卜地里翻土找黄萝卜。拿回来用脸盆放在支着三块土坯的灶上煮着吃。清水煮白菜根，黄萝卜吃起来真香，那白菜根的香味至今想起来还回味无穷。

为了解决住房拥挤，队上决定在3公里外的农场东建一个新点。当时选派了50名强壮劳动力，由一名副队长带队去搞基建盖房子，我也被选上了。大家伙说是盖新房，中午还补助一个2两的白面馒头都很高兴。每天早上吃完饭，就拿着工具步行到新点开始挖土脱土坯。先把土挖上拍碎，掺上麦壳拌均匀，浇上适量的水后，一边光着脚在里面来回踩，一边用铁耙上下反复耙着。泥和好后要闷上几个小时，这时趁空我们把头天脱好已晒的半干的土坯立起来，把干的土坯一排一排垛起来，再盖上麦草防雨淋。中午，队上食堂送来了饭，每人半斤米饭，补助一个馒头，还有一大碗菜汤。大家赶忙吃完，顾不上休息就开始脱土坯。两人一组，每组脱1000块，哪个组先脱完就主动帮助没有脱完的，大家一起脱完了，才一块步行回家。几天下来，双手打起了血泡。第二天照常上班脱坯。几天后血泡磨成的老茧一个连一个。两个月后土坯脱够了也晒干了。（林国进 口头述 吴金越 马晓虎 整理）

（口述人简介：林国进，汉族，1944年5月出生，1960年5月由浙江支宁来到前进农场，在前进农场八队任班长、会计，后在场部任办公室副主任、计财科科长，农场副场长，最后任西湖农场场长兼党委副书记等职。2004年退休。）